

中国福建民间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力研究 ——基于“一带一路”视角

蔡明宏

(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 福建 福州 350007)

摘要 东南亚与中国相毗邻,是“一带一路”的重心所在,也是中华文化的辐射区。福建民间信仰在东南亚播衍弥久,在凝聚华人群体和抵御文化同化两方面均具有极大的影响力。进入新时期,福建民间信仰又成为“一带一路”背景下新公共外交的有益助力,其民本性、世俗性和文化性、中华性特质弥补了中华文化走入东南亚在“顶层建筑”和“落地设计”之间的短板,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中华“价值观”的传衍和中华“文化自信”的构建。运筹地缘宗教资源优势,促使福建民间信仰在推动“一带一路”周边格局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是让世界了解、接纳中华文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途径。

关键词 民间信仰; 福建; 东南亚 “一带一路”

中图分类号 G1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9) 01-0158-10

DOI:10.15970/j.cnki.1005-8575.2019.01.016

一、福建民间信仰进入东南亚的历史成因

历史上,福建一带便有信仰巫术和崇拜图腾的传统,所谓“信鬼神,重淫祀”^[1]的社会习俗一直有着一定的影响。福建的民间信仰习俗在中国是极具代表性的,古谓“今之巫覡,江南为盛,而江南又闽广为盛”,^[2]而今福建亦是民间信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民间信仰的信众,其数量也大大超过了“五大宗教”信徒的总和。在福建,民间化的佛、道信徒远多于纯粹的佛、道信徒,亦即众多信徒虽挂以佛教、道教之名,实则却是以民间信仰形式来进行宗教活动。如,在闽地不少道教宫庙里往往陪祀不少民间神灵,道观里的三清神少人拜祭,而陪祀在侧的妈祖、关帝爷、临水夫人、保生大帝等民间神灵却香火鼎

盛,成为道观的主要香火来源。

福建毗邻东南亚,早在唐初便有福建人移居到菲律宾等国。宋元时期,移民到东南亚各国的闽人开始逐渐增多,19世纪后还形成了华侨出国的高潮。如今全球祖籍福建的华侨华人约870多万人,占全国华侨华人的三分之一,其中90%以上便是居住在东南亚地区。^[4]宗教的传播以地缘、亲缘和族群为主要路径,东南亚华人的移民迁徙历史便与源于祖籍的民间信仰的消长盛衰息息相关。在闽地民谚中有这么一句话:行船跑马三分命。早年移民到东南亚的闽人乘槎浮海、远涉重洋,面对惊涛骇浪的未知海域和前景渺茫的未知命运有着莫大的忧惧。因此认为唯有来自家乡、孕载着故土血缘和亲缘关系的神明和宗祠先祖能给予自己最大的力量。他们将妈祖、保生大帝等神像或香火袋作为护身符,放在离心

(收稿日期) 2018-06-18

(作者简介) 蔡明宏(1978-)女,福建泉州人。福建师范大学海外教育学院副教授,博士生,硕士生导师,民盟中央“一带一路”(福建)研究院研究员,福建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研究员。

(基金项目) 民盟中央“一带一路”(福建)研究院研究项目、福建师范大学印度尼西亚研究中心科研项目、福建师范大学高级别社科立项资助项目“东南亚华族文化身份认同与中华文化形象的海外传播”阶段成果。

脏最近的地方。不少文献中记载, 闯南洋者, “胸前要挂三包香火袋, 一包铜陵关帝君, 一包宫前妈祖, 一包走马溪保生大帝。祈请这三尊神祇, 保护贸易得当, 获得财利; 保护安全航行, 不遇惊风骇浪; 保护身体健壮, 不染病疾”。^[5]若顺利到了东南亚新垦辟的土地便立即建庙奉祀, 以感神恩。是故乡神祇慰藉了异域打拼的华人对中华文化的眷恋之情, 亦是民间神灵给予了他们在无助和惶恐中获得护佑和生存的希望。因而, 基于民间信仰对于东南亚华裔的深刻影响, 有学者甚至指出, “不了解华人传统宗教, 也就在很大程度上难以真正理解华人社会与华人文化”。^[6]

福建民间信仰传到东南亚等地后, 香火兴旺, 延续千百年都不曾泯灭。以福建民间“城隍”信仰为例, 福建省石狮市的“城隍”香火分传到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缅甸等地; 安溪的“城隍”分传到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 印尼的苏门答腊、雅加达也都有供奉“城隍”。而福建安溪市的“清水祖师”信仰也传到泰国, 有祖师公祠、顺兴宫、福元宫等; 在印尼雅加达有金德院、北苏门答腊有福临宫; 在新加坡有金兰庙、蓬莱寺、镇南寺; 在马来西亚有原名清水庙的蛇庙; 在缅甸仰光有福山寺; 在菲律宾、越南也都有清水祖师庙。被奉为“世界海神”的妈祖信仰在东南亚也十分兴盛, 仅马来西亚一地就建有天后宫 35 座, 新加坡供奉“妈祖”的天福宫, 由于建筑装饰精湛华美, 融历史、地理、民俗、文化、教育、古建筑、雕刻、美术等为一体, 成为巍峨壮观的中华宗教文化殿堂, 2001 年甚至获得亚太文化遗产表演奖, 成为国际重点文化遗产, 这还是新加坡建国以来第一次获得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奖项。

因而, 在学界还有一种说法: 要看中国传统的宗教习俗礼仪的原始风貌, 必须到海外华侨华人那里。因为, “虽然华人及其文化在适应当地环境变迁的过程中逐步出现了某种程度的本地化、现代化、西方化, 生活方式也有较大的不同, 但是在宗教礼俗方面的变化相对不大, 有些礼俗活动在中国本土因社会变动的冲击而变形甚至消失, 但在东南亚华人社会中却还可以看到某些传统的形态和风貌”。^[7]民间信仰历经千百年的消长与盛衰, 但在华人中很多仪式仪轨, 乃至

道德理念都完整而圆满保留着中华传统文化最古老、最正统的味道。

二、福建民间信仰对东南亚华裔群体的影响力

(一) 凝聚华人族群的功能

民间信仰与正统宗教相比, 属于无明确经典教义、无严密组织系统的“分散性宗教”(diffused religion), 由于其观念和仪式作为世俗社会制度的一种, 与基层民众的日常社会生活融为一体, 因而它在社会中的功能甚至要大于“制度性宗教”(insitutional religion)。正所谓, 人缘关系创造了神缘关系, 而神缘关系又密切了人缘关系, 民间信仰的“自发型”信仰特质, 在凝聚华人族群、密切人际关系上发挥着极大的功能。

民间信仰的祭典活动往往通过喧嚣热闹的庙会仪式、游神打醮等形式完成, 这种“人神共娱”的信仰模式以神明为媒介, 以繁多庞杂的活动样式、稳定少变的古老仪轨实现了华裔群体间的聚拢与交流。如闽地相当普遍的“王爷”信仰, “一年四季祭祀的王爷华诞多达 26 天, 各种典礼尊崇的王爷多达七八十位”。^{[3] (P.122)}“王爷”信仰中有一种“送王船”的传统祭典活动, 可追溯至明初。整个“送王船”活动延续 5 天, 按照古礼分为详尽的制造、出仓、祭奠、巡境、焚烧等步骤, “王船”巡游时往往有三五百人的队伍护拥, 十几支表演队伍同时跟随, 声势十分浩大。在泰国普吉岛有一个持斋节, 家家户户一连九昼夜素食吃斋, 在第九日便商店关门、市场停市, 全体参与到狂热的巡游队伍中。民众们簇拥着身穿红肚兜、脸颊两边被一根金属棍刺穿的神灵附体者游行。这种附体者能硬生生将尖锐的近两米长的金属长棍刺穿两颊, 不打麻药、没有血迹, 事后又能愈合如初。这类现阶段无法用科学解释的神迹往往会将巡游队伍中民众的虔诚推向高潮, 而程序严密的古老仪轨也使得这类狂欢庆典千百年来代代相承, 吸聚无数华裔子弟参与其中。它一方面满足了华裔群体在异域他乡抱团结集、守望相助的沟通、交往欲求, 另一方面古老的“狂欢化”仪轨所具有的象征意义又吻合中华文化中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的和谐美好愿景, 成为一道独特的中华文化景观。因

而，对民间信仰活动祭典仪轨的继承，不仅是对神明的敬畏和祈望，更是对华族文化特性的留存。

目前，随着华人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海外华人的祖先崇拜也正经历着从“宗族同祖”到“社群同祖”的演变，从整合宗族家族到承担整合重建华人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而民间信仰依然担当了凝聚社群，吸纳不同宗姓，实现新时期华族文化认同的功能和使命。从整合宗族家族到承担整合重建华人社会，这是一个重要的新课题，而民间信仰依然担当了凝聚社群，吸纳不同宗姓，实现新时期华族文化认同的功能和使命。

首先，民间宫庙还在原有的典祭仪轨上添加了不少现代性的公益、慈善的元素：如信仰遍及海峡两岸和东南亚各地的保生大帝，在厦门青礁慈济宫仍存有药签 144 首，其中内科 120 首，外科 24 首，一些处方至今仍可用于临床治疗。民间信仰宫庙素有设置义诊、施医赠药，甚至献药为香火的慈善传统，这一传统在东南亚地区与服务当地社群的公益活动相结合，吸引了更多的华族善心仁翁参与到宫庙的活动中。而以此为契机，以“慈善”为名壮大了民间宫庙的社会力量，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中国的民间信仰交流活动中，不少宫庙在近年来还兼具了前往中国旅游观光、养生健身等现代社会性功能，由此成为传递中华文化、凝聚华族群体的一种新型模式。

其次，民间宫庙在原有的典祭仪轨上也添加了不少文化演示、传播的元素，一些神灵诞辰庆典往往会配套举行丰富多彩的中华文化活动，如中华书法赛、传统造型花灯展示、点亮平安灯祈福、歌仔戏布袋戏等。从“求神”转向“自娱”，民间信仰的神秘性和封闭性随着时代的发展正逐渐被打破，文化消费性、娱乐性的现代功能浮上水面，这非常贴合现代华裔青年的审美喜好，激化和推动了华人青年保留、弘扬民间信仰的热情和积极性，同时，亦有效规避了民间信仰在年轻华裔眼中“迷信”、“老旧”等负面印象，极为有力地吸纳了更多的当代华裔青年参与到中华传统文化活动中来。

第三，民间宫庙在原有的典祭仪轨上又添加了不少科研、学术研究的元素。如福建福德文化节期间还举办了福德文化研讨会，来自马来西

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的几十位专家学者从历史、社会、宗教、文化、观光、管理等多个角度探讨东南亚华族移民的历史背景、华族社会的深层结构、中华文化在东南亚的文化认同等深层次问题，充分彰显出民间信俗文化在高端层面的进一步开掘。这类学术研讨释放出一个信号：福建民间信俗文化并不仅是一种民间的、底层的流动，它已经逐渐吸聚了东南亚国家侨领、专家等高层人士的关注，它在凝聚华族力量方面已经逐渐显露出全方位、有层次、高水平的一种构建。这是民间信仰在进入新时期之后呈现出的一种良性成长。

（二）抵御文化同化的功能

时光荏苒，新生代的东南亚华裔如今成长于华语缺失的生活境遇里，甚至生活在族群关系紧张的历史氛围里。例如，印尼 1965 年至 1998 年间层出不穷的排华事件，使得印尼华人的“华人意识”一直处于较为压抑的状态。虽然有专家指出，华人在所在国的强势经济地位会使华人产生某种自豪感，这将有利于华人意识的维护。^[8]但是仅靠经济力量的强弱来作为“华人意识”守持的保证，毕竟显得单薄。市场经济的波动总是表露为某种功利和急促，作为华人文化精髓高度凝聚的“华人意识”（Chineseness）体现出的是华族自我评价、自我界定的稳定趋度，很显然它需要的是另外一种驱动力的维护。因而，当东南亚新生代华裔面对西方意识、土著文化、中华传统纷至沓来，这一切都交融成他们复杂的思想意识和精神观念。他们处于建立自己的现代文化观念体系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受祖辈的影响，对于中华文明有着隐晦而悠远的期待；另一方面受周边环境的影响，西方文化、居住国文化成为无法抹去的文化印记。两个方面互相博弈，假若东方文明的影响力减弱，东方传统道德和西方现代文明遭遇分裂，孝道、忠义、仁善等中华文化在现代人的价值观念中面临坍塌，华族后人便会逐渐失去中华民族的特征。

此时，民间信仰的文化属性对中华文明的留存起到了保护和延续的功能，它以有形的庙宇宫殿、祭典仪轨等组织构架稳定而扎实地传递着中华文明精神内核，又以无形的宗教信仰属性从精神层面对民众的精神诉求予以慰藉，以天命和神灵敬畏的手段对文化道德伦理的舆论形成予以规

约。如日据时期的台湾，当时日本企图以神道教和靖国神社取代中国台湾的民间信仰，以此阻隔台湾与中国大陆的文化渊源关系。民间信仰的首当其冲，福德正神、关帝圣君、保生大帝、天上圣母妈祖等塑像均遭惨毁，但这也反过来意味着民间信仰承载了广大民众强烈的民族意识，沉淀着浓厚的民族文化心理。当时的这些残酷的手段并不能扼杀民间信仰，民间信仰的民本根基之深厚是任何力量都无法轻易撼摇的，台湾民众灵活地采取沿溪设案“上白礁”的祭典仪式来遥祭大陆祖庙暨列祖列宗，借助民间信仰的祭祀形式来反抗侵略者的文化吞噬。这一仪式绵延300余年，至今在台南学甲慈济宫还有一块“我台人士祖籍均系中国移来”的石碑。由此可见，民间信仰的祭祀仪轨对于中华民族情怀和人文情结有维系作用。

在东南亚的民间信仰宫庙中，也可以清晰地看到华人通过民间信仰延伸出“尚本”的文化观念和浓厚的“寻根”意识。泰国普吉岛主祀清水祖师的福元宫，庙貌与中国闽南的宫庙几乎一致，庙内神龛前的两根柱子上镌刻着“保我黎明老少咸歌德化千古事，佑尔赤子夏夷竟祝馨香极万年”；新加坡天福宫《碑记》上有这么一句“我唐人食德思根，公议于新嘉坡‘直隶亚翼’之地，创建天福宫。”印尼西兴宫《碑记》上也写着“且使唐人之不忘本焉”；泰国洛坤省宋卡府的宋卡城隍庙，至今仍保存着“永祭宋邦”“威震蛮邦”等匾额。这些留存在东南亚民间宫庙里的碑记、匾额、楹联，非常清晰而深刻地表露出了华裔对祖籍国的眷恋、思慕与认同。所谓人同祖、神同源。不少学者十分感慨“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往往通过民间信仰的进香谒祖活动曲折地折射出来。”^[9]民间信仰通过对“祖庙”与“分灵”之间的渊源承传的确认，表达出的是自我与中华传统文化中根与叶、源与流的密切关系，换言之，民间信仰以一种间接、迂回，然而有效的手段为通往祖国、故土、宗族的文化认同疏通了一条坦途。

首先，民间宫庙成为应对异域文化同化的坚实“堡垒”。由于在东南亚祭祀同一神明的华人，一般都是同一宗姓或同一祖籍地，此时供奉民间神明的庙宇便成为他们宗族成员聚集的场所。在东南亚华侨华人社会具有宫庙、会馆、华

校三位一体的特点，如祖籍福建永春的华人陈金声便在新加坡天福宫建崇文阁，此开华文教育之先河，天福宫亦成为“传播乡音乃至祖国传统文化的据点”。^[5]因而，在东南亚常常会看到民间宫庙与宗乡会馆同居一室、连为一体、不分彼此的现象。如缅甸的中国福建晋江公会，与城隍庙合二为一，底层供奉城隍与福德正神，三层供奉观世音菩萨，顶层供奉释迦牟尼佛，唯有第二层才是宗族公会的会所；新加坡的福建会馆在华民政务司登记时便以“天福宫福建会馆”之名注册，民间信仰不仅与宗族乡会合为一整体，民间宫庙甚至还会排在宗乡会馆之前。而东南亚有些民间信仰宫庙，已成为当地经济、文化乃至政治中心，如菲律宾马尼拉地区的菲华通淮庙，就是菲律宾洪门致公党成立的支部所在地。

显然，宫庙、会馆、华校，一个代表信仰习俗，一个代表宗族系统，一个代表华人语言，当神明、祖先、语言文化这三者在异域他乡安定下来，便犹如以三足鼎立的方式安放了海外华人漂泊无依的心灵，这是东南亚华裔精神灵魂深处价值观的一种曲折外显。对血缘、地缘、神缘的认同，增强了他们对中华传统文化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而有神缘之处，更是地缘、血缘、亲缘的聚汇之所，三者之中，民间信仰被认为是最固守传统文化的精神堡垒的一种文化现象，无论是典祭祀仪轨还是观念取向，它都包蕴着浓厚的中华文化意味，其丰富的“中华性”已成为学界的普遍共识。

据笔者田野调查发现，早年东南亚华裔以“方言”划分祖籍归属、联宗睦族的方式在岁月的烟尘中已经悄然褪色，在东南亚很多第三代、第四代的年轻华裔，其父母亲虽然还是讲地道的中国闽方言，但是兄弟姐妹之间，乃至儿女与父母之间说的是混杂着闽方言和所在国语的语言，这种语言已经失去了纯正性，甚至于中国说闽南语者都完全听不懂。所以，时至今日一个不可逃避的事实是，不仅是汉语普通话，甚至连方言都已经逐渐丧失了其甄别华族身份的功能，我们无法再以方言的归属地作为华人文化凝聚力的主要依托。因而，相对于各国华文教育史上的一波三折、步履维艰，相对于现今孔子学院发展的喜忧参半、时有异议，华人的传统民间信仰因其在东南亚国家的有利法理基础，在延续、承传中华文

明上彰显出不可取代的价值与功能。有学者分析“对传统宗教礼俗的保留是许多没有接受母语，并且也与中国本土失去联系的土生华人没有被完全同化的主要原因。”^[7]

其次，民间信仰成为缓冲异质宗教渗透的文化“屏障”。新生代的华裔大多受西方文化的影响，极易转向信仰基督教、天主教等西方宗教。然而宗教问题本身就不是一种单纯的信仰问题，宗教活动往往通过各种隐晦的形式顺利完成某种意义上的文化渗透，进而实现价值观的转移。而民间信仰中潜蕴着神灵崇拜与祖先崇拜相交织的儒家孝道观念，在中国民众的生活习俗中，忌日、诞日、节庆日家家户户都要供奉家中祖先神主牌位。在闽地风俗中，祖先牌位与家中的地方性神明往往同时摆列在香案上，祭祖和祭神浑然一体。东南亚华人各种宗亲会和宗祠也经常以祭祀祖先的名义举办各类活动，家祭、庙祭、年庆祭均混合交叉。当家庙与宫庙结合、祖先崇拜和神明祭祀结合，体现出中国传统的宗祖家族制度和民间信仰的一种互动。

笔者发现，东南亚华族对于“家族”观念十分看重。这是脱离母国之后的一种精神漂离。他们往往趋向于将对祖国的眷恋转变为对家园宗族的热爱，这是东南亚华裔在社会历史变迁中沉积的独特的乡土家园情怀。

而民间信仰作为来自故土的传统，挟裹着浓郁而醇厚的宗脉家族基因。是民间信仰让他们获得对家族的归属感，对民间神灵的崇祭与对家庭祖先的祭祀在某种意义上几乎并无二致。民间信仰以及其浓郁的亲缘、地缘、血缘基因让爱“家”甚于爱“国”的海外华裔群体紧紧围绕在它的周围，而民间信仰活动在不自觉间延续和培育着中华崇宗敬祖观念，并以一种不需要外界强制性力量的督促而自然习得的方式在华族间传承。相对于设立一所华语学校的漫长、艰辛与复杂，民间信仰润物无声地悄然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祖有功、崇有德”等伦理道德精神渗入了一代代华族的内心，纵然千百年的风霜都无法抹杀。显然，对民间信仰的笃定已成为与西方宗教的文化拉锯、文化渗透的一股坚强的力量，它传递出一种信念：华族民众不需要以西方的宗教形式来生活，因为民间信仰与祖先崇拜相交织十分吻合儒家孝道观念，其浓烈的香火相传意识带来一种

强大的传统文化惯性，在看似分散无序的民间神灵表象背后，是具有民众规约性和内在稳定性的中华伦理道德的文化承传，其内在逻辑和演变规律因为有着中华传统文化的强大丰厚的支撑而显得有条不紊。这是值得弘扬和肯定的一种文化态度。

三、“一带一路”格局下民间信仰在东南亚的新公共外交价值

伴随着中国全球化程度的加深，中国逐步进入了公共外交时代。传统的公共外交将直线平面的政治外宣作为旨归，以集中化的官方传媒为主要手段。近年来民间力量的介入促使以非政府组织为主核的“新公共外交”理念赫然崛起，它将公众视为信息流通的传递者和利益决策的影响者。而在“一带一路”的格局内，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上，不少专家一再强调丝路“五通”愿景中的“民心相通”是关键和核心。民间信仰作为人类最为古老的信仰之一，它是底层民众的精神家园，福建民间信俗在走向东南亚各国的历史播衍中，成为世界民众了解中华文化的一个窗口，亦成为华族抵御文化同化的一种途径，对它不能仅仅进行单纯的学理研究，而应放在国际性公共外交的场域内加以观照。目前学界的关注眼光，更多投向的是民间信仰对于国内和谐社会的创建、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系建设，以及新时期基层农村的文化建设等方面的功能研究。可谓向内观者多，向外望者少。而福建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核心区之一，具有面向东南亚的重要区位优势 and 侨缘优势，福建的民间信仰秉承了闽文化中的“海洋性”特质，在进入东南亚之后它在某种意义上悄然担负起了与东南亚各国进行文明对话、传递中华文化、营造中国图像的新公共外交使命。

（一）“顶层建筑”与“落地设计”的实现短板

文化一词，在中国古代有“文治教化”之意，“文治教化”既寓意儒家文治，又难免将“文化”置于“教化”的高端。于是国人在传播文化上总无法避免“居高临下”的“教化”之态。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上，往往惯性地将中华文化凝缩为“精英文化”、“高端文化”，其传播途径并不以“走出去”为要，反而

掺杂着不少“送出去”的慷慨与高调，这是我国在文化传播中一种存在已久的误区。须知，将目光紧紧盯住高端文化，服务精英团体，很容易让文化传播的航向产生偏颇。据笔者实地走访调研了解，“送出去”的这些高端奢华的文艺演出虽是“精华”，但是曲高必然和寡，它们在东南亚国家的受众群并不大，其市场运作也非常低效，对目标受众缺乏研究，地域“对接”也欠缺考虑，这类文艺演出过度依赖于政府的资金扶持，无法进入可续循环、良性运作的轨道。

可以说，文化“走出去”在表面上繁华璀璨，但思路单一化，只专注精品文化的“精英路线”，对于海外普罗大众的文化需求、审美特征较为漠视，“顶层建筑”与“落地设计”之间出现了断层。国家主席习近平2016年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出席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座谈会时曾发表重要讲话，他就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提出8项要求，其中之一便是“切实推进民心相通，弘扬丝路精神，推进文明交流互鉴，重视人文合作。”仔细审思这四句思想所用的措辞，无论是“相通”、“互鉴”还是“合作”，都非常强调平等的姿态。在“民心相通”的愿景里，文化“走进”的也是海外普罗大众的“民心”，而不是仅限于“顶层建筑”的社会精英。将中华文化完全诠释为“高端文化”，为了这种“费而不惠”的“白送”工程而一再向国家伸手，以“送出”“一台戏”、“一部剧”或者“一个展”的方式来完成文化的国际性传播，不仅难以持续，并且难免带着精英文化趾高气扬的睥睨与清高，圈子小、范围窄，这是与国家“走入民心”的文化传播思想相违背的。在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的问题上，不仅要让海外民众“听得见、听得清”，还要达到“听得懂、听得进”的最佳效果。因而，“顶层建筑”要与“落地设计”相结合，“面向精英”与“面向大众”都必须兼顾。

曾有学者将文化分为“雅文化”与“俗文化”。“雅”文化主要指系统完整的知识谱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如伦理道德、社会观念等层面；“俗”文化则更体现为一种带有自发性和传承性的底层文化现象。福建民间信仰作为民众世俗生活的一部分，它几乎兼容了两种文化取向“一

方面是礼仪化、人文化的取向，另一方面是数术化、巫术化的取向。”^[10]简言之，无论是雅化途径，或是俗化路径，福建民间信仰都相当具有典型性。

（二）福建民间信仰的世俗性与民本性特质

福建民间所奉祀的神灵十分杂芜，“既有闽越族和其他土著民族残存下来的鬼神，又有从中原传入的汉民族所奉祀的各种神灵，还有从印度、中东、欧洲等国外传入的神灵。特别是福建民众所创造的神灵数量十分惊人”。^[14]这些自然神灵、祖先神灵、圣贤神灵、民间俗神进入东南亚之后，对于华人的生产习俗、生活习俗、人生庆仪、岁时节典等各方面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可以说，华人的民间活动中，我们难以找到没有信仰意味的文化活动。在海外漂泊的华人笃信他们出海有航海保护神妈祖，驱瘟有家族族姓王爷，生病有医神保生大帝，求学问有文昌帝君，求财有关圣帝君，即使老幼妇孺也有临水夫人等予以特别护佑。真可谓是入门有门神，喝水有井神，入睡有床母，吃饭有灶神，甚至入厕也有厕神。例如，在闽地，把祭品摆到床铺之上祭拜“床母”是十分独特的一种风俗，他们相信如果家中孩童容易夜半惊醒哭闹，这就是属于“床母”的职责范围，只要予以祭拜便可保孩子安宁。福建民间信仰的这种“俗”文化特质极富于乡土味和人情味，而这些生活习俗也深深影响了所在国居民。如泰国普吉主祀清水祖师的福元宫，到庙祭祷的不只是华人，还有不少当地人；菲律宾马尼拉大千寺举行庆祝广泽尊王大典，当时菲律宾副总统在内的达官贵人均送花篮以示祝贺；菲律宾天主教教皇还特封妈祖为天主教七圣母之一，隆重地为妈祖“加冠”；而“拿督公”（Datoh）信仰是马来语“拿督”和华语“公”的结合，拿督信仰本是马来西亚人原始宗教信仰，但马来西亚华人将其纳入华人民间信仰的神灵体系，与华人习俗相交融。这一因“融合”而新创的信仰在当地香火鼎盛，甚至当地马来人对“拿督公”信仰比华人还要更虔诚。

并且，民间信仰中作为民众生活“俗”文化的代表，其“民本性”特征也十分明显。以“土地公”为例，土地公在中国传统神明谱系里地位是最为低微的，《西游记》中孙悟空动不动就把土地公叫出来戏谑一番，但是遇到困难，第

一个想到的也是寻求当地土地的帮忙。它最卑微，也最实用，几乎是广大普通百姓自身身份的映射。在闽南民众的家里，几乎每家每户都供奉着观世音菩萨和土地爷。观世音在佛教系统里属于“菩萨”，其地位高于天界诸神；而“土地公”仅仅是地位低微的地方守护神，连天界神仙都算不上，更不用说“菩萨”的阶位了。但是在闽南人的家庭里，观世音菩萨的塑像都是紧挨着土地公，二者是平起平坐的。在民众的思想观念里，观世音菩萨是“大神”，掌管着苍生福祉；而土地公虽是“小神”，却守护着自己家宅的顺昌，二者对于自己的家庭福祉的重要性并无二致，甚至有时“土地爷”的塑像还会大于“观世音菩萨”的塑像。在福建的民间信仰里，土地公是最贴近民生的神祇，尽管位份低卑，却是最为主要的的神祇，甚至可以凌驾在菩萨与诸天神之上。在正统宗教谱系里神灵地位的高低秩序，在闽人的思想观念里却几乎遭到了颠覆。这种对于正统宗教层级清晰、地位分明的“阶级观念”的选择性漠视，十分鲜活地传递出了一种朴素的“民本位”的思想诉求。

福建的民间信仰虽然是一种在底层、民间流动的世俗文化，但是它承载了丰富而深刻的内涵，不能简单粗暴地把它归入神汉巫婆范畴的“迷信”场域，它关涉民生问题，是中国百姓基本精神和生活面貌的一种反馈。它不是只有斋醮游神、扶乩做法，“而是不断吸收、改造其他观念形态过程中愈加宏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体系‘普化’于下层民间的缩影”。^[11]当漂洋过海谋生的华人将祖籍地的民间神明带到异国他乡，无论是私密性的烧香、抽签、占卜、算卦等个体祈祷形式，还是群体性的庙会、戏会、餐会以及游神、巡街等大型活动载体，它几乎满足了东南亚底层民众世俗生活方方面面的需求，可以说，它以非常“接地气”的方式渗入东南亚普罗大众的精神层面和生活层面，民间信仰的世俗性、普化性正好弥补了“文化走出去”精英路线的缺憾和短板。

（三）福建民间信仰的中华性与文化性特质

民间信仰因其民本、民俗、民生的坚实性民众基础在东南亚华族中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同时它也包涵着丰富的中华伦理道德文化精髓。传入东南亚的民间信仰以崇祖敬宗的祭奠仪式促使民

众在不知不觉间自然习得中华的孝道观念，又或者以恭祀英烈的游神仪轨促使民众在不经意间自然悟到中华的忠义仁善理念。这一切都显得巧妙天成，不着痕迹。对于受学校教育程度不高的普遍民众，它的普世性特征尤为浓厚，民间信仰所起的道德教化丝毫不逊色于文人案牍传递出的孝义信念。

以福建泉州通淮庙为例，它是海外各地关帝信仰的祖庙，每年进香客达100多万人次。里面现存签诗100签，每签都是一首七绝诗文，这类民间信仰宫庙里的签诗，在劝善戒恶里包含了丰富的人生哲理，虽然是以佛、道观点为表现形式，但是签诗的作者多为民间儒学之士，渗入了儒家学理的精髓。如第七十六签中“东波解”：“所谋未善，何必祷神，当决于理，改过自新，但能孝悌敬君事亲，和气生福，家道回春。”这一签诗非常明显地指出只要守孝悌、事君亲、多改过、生和气，便能“家道回春”。因而，万事“当决于理”，而不必“祷神”。这种“理高于神”的现世观念活活现地表现出中华儒学的核心价值观。虽然这类民间信仰签诗以民间神灵的旨意为依附，但对于神佛的“天命”却并非以“迷信”的态度来揣度，而是将儒家、道家、佛家的思想精华不着痕迹地糅合在一起，最终汇聚成中华文明宽宏博大而微妙精深的价值观。

以灵活多变的方式承载、推广中华“雅”文化的精髓是民间信仰的一大特色。东南亚各界对华族的宗教信仰认定几乎也是以中华文化为标杆。如新加坡对中国宗教的界定是信奉老子或孔子哲学、施行祖先祭拜或其他中国神祇的膜拜，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基本类似。其实海外对于中国式宗教的很多界定往往偏向于指向“民间信仰”的范畴。在海外人士的眼中，民间信仰被当成是中华文化的一个子系统，都是中国哲学体系中的老子与孔子的代表，承载着中华文明因子，即使儒学也归类于“儒教”。因而，宗教文化在海外华人所在国政府当局以及当地民众心里都是华人文化的重要象征，是华人族群认同的主要形式，甚至现今海外华裔自身也无法清晰地分辨将儒、道、佛与民间信仰加以区分，它已成为囿于的一个整体，一个无法分割的文化综合体。

一方面，中国的祖先崇拜和民间信仰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这一点在东南亚华族中尤其明

显。传入东南亚的民间信俗文化有着强烈的家乡故土的地缘、亲缘特性，它将祖先崇拜和神灵祭祀融为一体，与闽地风俗一样，祭祀民间神灵成为宗族组织的主要职责。对祖先的追缅祭拜是民间信仰的主要内容，体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特征。由于对尊祖敬宗、传承祖德的重视，华族牢记移民先祖筚路蓝缕、拓荒垦殖的艰辛不易，通过祖先祭祀和神明祭祀相结合的民间信仰活动自然而然地将中华传统中敦孝悌、睦亲邻、明礼让、尚节俭等中华“雅”文化代代传承。因而，激活宗族观念，承传民间信仰的祭祀礼仪传统，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激活中华传统文化，是传统复兴的一种表征。

另一方面，民间信仰神灵中有极大部分是对造福人类社会的自然或人造神灵的供奉，如保生大帝，他生前立志行医，普济众生，后采药坠崖，乡人感念恩德，建庙奉祀；广泽尊王，因生前伺母甚孝，歿后被尊为神。在新加坡的金兰庙，主神清水祖师，陪祀诸神中还有被称为“青天”的包公，这些都是民间认可推崇的忠孝仁义人士。因而，无论是“孝行”，还是“济生”，对这些民间神灵的奉奠祭祀里，传递出的是民众对中华“雅”文化系统里的“五常”即仁义礼智信、“四维”即礼义廉耻、“八德”即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价值观的推崇和承传。民俗信仰中虽带有宗教色彩，但多以匡扶正义、赏善罚恶等道德观念为主旨。通过民间信俗活动来表达崇德敬贤，不再是单纯的宗教性活动，而是具有文化意义的一种社会行为。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4 年主持政治局集体学习时提出，要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我们的根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等时代价值需要我们去传递；中华文化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华民族血液里融汇的“和”文化需要我们去阐发，只有将一个真实、和谐、发展的中国图像呈现在世界面前，才能够化解矛盾和消除疑虑，赢得最广泛的支持。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文化推广格局中，民间信仰既承载了丰厚的中华“雅”文化精髓，又以其浓郁强烈的民本性“俗”文化特质规避了“高端文化”走出去时曲高和寡的短板和不足，兼顾了“顶层建筑”和

“落地设计”的实现，因而，在文明互鉴、文化交流方面它可以说是民间的大使，是新时期公共外交新生态的有益助力。

四、结语

东南亚与中国比邻而居，可谓山同脉、水同源，这种天然的地缘共性引起了诸多研究者的兴趣，有学者明确指出“一个对你友好并给你带来利益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居而使这种利益倍增；一个对你不友好并给你带来损害的国家，会由于它是你的邻国而使这种损害也倍增。地缘的远近在这里具有重要的作用。距离近的国家，相对于距离远的国家来说，对本国的影响力会大得多。”^[12]的确，东南亚扼印度洋与太平洋之间的交通要道，是关系到中国安全利益的重要地区，东南亚也是中华文化的主要辐射带。福建籍的华侨华人 90% 以上居住在东南亚地区，闽文化历史形成的开放性、辐射性、世界性使之成为传播中华文明的先锋，闽文化作为中华文明代言者和窗口的意义仍然值得重视。

当唐宋以后西域的“丝绸之路”逐渐冷清，中华文明的对外窗口逐渐让位于“海上丝绸之路”。福建多山滨海的地理特性，曾缔造出灿烂的海洋文化和移民文化，缔造了辉煌的对外交流史。中华文化浸濡着儒式的宁静、淳厚与安守，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内敛型”的文化，尤其是明清以降，更趋封锁幽闭，它自身并不着力于向外播传。于是，从东南沿海传播出去的闽文化，成为 17 世纪以来中华文化对外传播的主要途径。福建民间信仰便是福建“海洋”文化的一个典型代表，它以其稳定性、延续性在东南亚播衍弥久，并且“这种由民间传播于海外的一般民众生活方式，逐渐在海外形成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象征”。^[13]当华文教育、华人社团乃至华人姓氏都受到“在地化”的巨大冲击，民间信仰却成为屹立不倒的维系民族特性、存续民族文化的支柱和重要载体。

今年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要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但最根本的是一个文化自信，要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找精气神。因而，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问题上，重点不在于用何种文化形式，而是要致力于推介能够体现“文化自信”和“价值观”的关

键元素。福建民间信仰传播到东南亚之后,一方面,它完成了把华人族群与其他民族相区别的重要标识任务,华人把建筑寺庙的一草一木、一花一石,乃至神像香炉,均原样照搬祖籍国庙形式,东南亚各民间“分灵”宫庙与中国民间宫庙祖庭往来密切,回传力量强劲,成为中国与东南亚周边国家民间文化交流的重要渠道,其携裹的中华文化基因影响了海外华族民族性格的形成,实现了中华“价值观”的有效传衍。另一方面,民间信仰也完成了华人与居住国社会文化的交融与适应,并以其稳定的仪轨范式与道德观念影响了当地民众的文化模式、宗教礼俗,参与了居住国人文环境的创设,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之间建立起一种超越冲突的和谐文化,体现出以中华文化构建人类精神共同体的“文化自信”。时至今日,福建民间信仰亦成为推动“一带一路”背景下公共外交的有益助力,向外推介民间信仰,扶植民间信仰的正能量,也是让世界了解、接纳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途径,是实现当今时代“文化走出去”目标不可忽略的一个版块。

因而,如何将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民间信仰资源进行整合升级,打造多元的精神文化共同体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近年来,政府已然注意到传统信仰文化蕴含的民族性意涵,而国际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活动也促使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开始关注传统文化中以典祭仪轨、民俗礼仪为活动载体的民间信仰的生存状况,国家相关部门也已开始重视对“五大宗教”以外的民间信仰进行研究和管理工作。

但民间信仰的保护、延续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有些信仰仪式在现代文明冲击下已近失传,“保护”和“抢救”是当下文化政策的关键,“永续”和“提升”也是民间信仰生存的必须。据笔者田野调查,以厦门海沧区保生大帝瑞

青宫为例,丙申年保生大帝绕境巡安文化节收支情况显示,农历四月初一至初九的9日绕境活动总支出达到1073122元,收捐献款为684560元,亏空的38万多由该宫管委会董事长垫付。此外,一些民间宫庙庙产因历史沉积原因,责权不明,迟迟无法归还,日常运作捉襟见肘;有些民间宫庙勉力建造了民间文化讲习所,但缺乏足够的活动场地来进行文化的推广与提升。很显然,很多这类民间文化活动急需政府扶持。然而民间信仰在不少地区被政府当做新的经济增长点,主要以能否成为旅游资源带来经济效益来决断其存留,“有利地方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民间信仰对象,政府就给予重视和保护,其它信仰对象基本处于无视泛滥的状态,更谈不上针对民间信仰整体的政策制定和规范条例的出台了。可以这么说,针对民间信仰的政策,在中国大部分地区仍然是一种真空状态,或者仅仅出现过不成体系的条文”。^[14]要实现民间信仰的对外文化交流的平台效能,就要为其生存创造良好而规范的文化生态,要明确民间信仰作为民族文化资源的特质,而非纯粹的利益谋求工具。

目前“由西方传入的宗教在中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政府制定了一系列保护和规范宗教活动的政策。然而,中国本土的、具有广泛信仰基础的民间信仰,却少有相关政策的出台,或者政策缺失,这个现象确实是一个有趣的话题,但却是一个严肃的现实问题”。^[14]民间信仰具有其他宗教无法代替的浓郁乡土特色和深厚的底层民众基础,民间信仰需要宗教界、学术界和政府部门的合力扶持和指引。如何立足于“海上丝绸之路”高度,让民间信仰参与到对外传播影响力与话语权建构中,促使福建民间信仰这一极具民众传播力量的文化模式在推动“一带一路”周边格局中发挥实质性作用,是非常值得重视的一项课题。

(参考文献)

- (1) [汉]班固.汉书地理志.[M].卷28.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社,1987
- (2) [明]谢肇淛.五杂俎.人部二[M].卷6.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 (3) 习五一.简论当代福建地区的民间信仰[J].世界宗教研究,2008(2).
- (4) 李天锡.福建民间信仰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其影响[J].华侨大学学报,1998(1).
- (5) 连心豪.闽南民间信仰是维系海外“三胞”的精神纽带桥梁[M].谱牒研究与五缘文化研讨会论文集,2008.(11):395

- (6) 贺圣达,刘金光,张禹东,段立生,郑筱筠.对话宗教与东南亚区域社会发展.[J].世界宗教文化,2012,(5):50
- (7) 张禹东.东南亚华人传统宗教的构成、特性与发展趋势[J].世界宗教研究,2005,(1).
- (8) 庄国土.略论东南亚华族的族群认同及其发展趋势[J].厦门大学学报,2002,(3)
- (9) 范正义,林国平.闽台宫庙间的分灵、进香、巡游及其文化意义[J].世界宗教研究,2002,(3).
- (10) 邱永辉.“世界宗教”视野下的中国民间信仰[J].宗教学研究,2016,(1).
- (11) 林国平.民间宗教的复兴与当代中国社会——以福建为研究中心[J].世界宗教研究,2009,(4).
- (12) 叶自成.地缘政治与中国外交[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8:16
- (13) 陈支平.闽南文化的历史构成及其基本特质.[J].闽台文化研究,2014,(1).
- (14) 蔡登秋.民间信仰状况与信仰政策——以闽台民间信仰为例[OL/EB].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cssn.cn/sf/bwsf_wh/201312/t20131205_895454.shtml,2012.09.25

A Study of the Spreading Power of Fujian Folk Beliefs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I Ming-hong

(Fujian Normal University, Fuzhou, Fujian 350007)

[Abstract] Southeast Asia, adjacent to China, is the strategic focus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also the radiation area of the Chinese culture. Fujian folk beliefs, having been spreading in Southeast Asia for a long time, have a great influence on both uniting the Chinese ethnic groups and resisting cultural assimilation. In the new era, they have become a useful help for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Their civilian, secular, cultural and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ve made up for the short board between the top building and landing design when the Chinese culture is introduced into Southeast Asia, and in a sense, they have spread the Chinese values and constructed the Chinese cultural self-confidence. Taking advantages of geographical and religious resources and making Fujian folk beliefs play a substanti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strategic patter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re extremely important ways for the world to understand and accept the Chinese civilization.

[Key words] folk beliefs; Fujian; Southeast Asia;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责任编辑 边 笈)